

世界變局的心理分析

吳澤炎

第一次歐洲大戰結束以後，推究戰首罪魁成了時髦一時的論題，飽受了四年戰禍的人民，在心理上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要追究：是那一個人或個人應負造成戰禍的責任。凡爾賽和約中曾經明白規定德國應負戰禍的全責，對於德國廢皇威廉二世特加規定應受協約國的鞠訊，不過後面這一條，也許由於英美的不願好為過甚，也許因為當時的荷蘭政府不願將廢皇移交協約國，所以始終成爲一紙具文。但到了戰爭的情緒漸淡以後，大家便開始在引起戰爭的近因以外，轉而注意到戰爭的遠因了。其時由於各國外交當局的先後公布戰事前後的外交文件，尤其在蘇聯革命以後，布爾塞維黨人初次將沙皇時代各種秘密文件，全部公之於世，更給了學者們以大量的研究資料。在這一方面，成就最高和最負盛名的當推英國的歷史學家顧渠 (G. P. Gooch)。一般人對於顧渠及其他歷史學家的看法，往往有所誤會，當做東萊博議式的翻案文章。其實並不然。他們絕對不想爲德國或德皇開卸戰禍的責任，不過他們堅持的是：他們以歷史學家的身份，對於政治事實的歷史演變，應該透過個人，作一種更深遠的推究。那就是除了個人與國家的應負的引起戰禍的直接責任以外，對於引起戰爭的深長背景，使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的條件，也應該有真知灼見的認識。以具體的例證而言：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前夜，西歐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事實上已到推車撞壁的窮途，處於窮極必變的階段，但這個「變」之何以不出諸革命的形式，而出諸綿亘四年廣及全球的大戰形式，那顯然與德國的軍國主義傳統以及威廉二世個人的窮兵黷武的野心，有重要的關係。所以研究歷史或政治的人，不應專門或泥於人物 (characters) 的活動，因爲他們的活動大體上是受各種現

實的條件所限制的；我們必須透過他們的活動，去發現和把握驅使人物活動的各種社會動力 (social forces)。

這一觀點也同樣適用於正在「結束開始」階段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引起戰禍的直接責任而言，這一次比上次的歐戰更要明顯得多。在上一個歐戰前，協約國和同盟國中間的利害關係，錯綜複雜，縱橫捭闔，雙方的壁壘雖未必分明，卻是旗鼓相當，都是採取攻勢的姿態。所以在戰事發生前所一再出現的多次的局部衝突中，其是非得失，常常有可以爭執的餘地。反之，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戰事爆發以前，英法以至美國各民主國家卻一貫採取息事寧人的守勢策略，無論在軍事在政治在經濟方面，他們的最高策略是在求現狀 (Status quo) 的維持。英國故相張伯倫的綏撫政策便是最具體的表現。反之，軸心的德意日，他們標榜爲「無的國家」(Have no's)，卻自始就採取不惜以隣爲壑的一貫的侵略姿態。這一種侵略的姿態再加上了德國狂妄的種族主義，日本的「八紘一宇」的誕語，更使抽象的爭取「生存空間」(Lebensraum)，而成爲一個征服世界的具體計劃。至於世界大戰中的一環——中日戰爭的責任比歐洲的戰爭更要分明。新中國所要求的，不過是要使中國成爲一個內足以自存，外足以共存的現代國家。這一種政策對於日本的合法利益並沒有妨礙，中國國民經濟的改善，四萬五千萬人的購買力如果平均每人增加十元，就儘夠使日本的生產機構獲得充分的就業。但是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對於日本軍部獨霸東亞以至征服世界的野心都是不能兩立的。日本帝國主義絕不願有一個統一獨立的中國，在她用種種陰謀而仍不足以阻止統一獨立的中國出現之時，她就採取了最原始式的侵略：九一八的侵占東北

120968 四省，一二八的淞滬戰事，七七以前的華北的特殊狀態，終於引起了這次中國在歷史上堪稱空前的全面抗戰。因為德意日在這次戰爭中的責任，遠較上次大戰德國和奧匈帝國為分明，所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以及他們的同謀者的個人責任，也要較廢皇威廉大而明確得多。

但國家或個人的責任，只是瞭解這次戰爭本質的關鍵之一，為欲認識這次戰爭的全貌計，我們仍須從狹義的人的觀點，轉而到「社會動力」的觀點。換言之，我們在肯定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及其從黨應負的戰禍責任以外，更要追索促成他們赤裸裸侵略行動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的條件。這個問題，並不像表面上看來，只是一個理論的問題，實際上卻與戰後世界能否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有密切的關係。因為除非對於促成戰禍的深長背景，有了全盤的透澈的認識，然後對症發藥，從事建設性的根本改造，否則單把幾個元首巨魁，明正典刑，結果「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同樣的背景，還可以產生出同樣的人物，或者還要變本加厲，亦未可知。德國國社黨和希特勒政權的崛起，便是眼前風光的一個例子。

就根本性質而言，目前的戰爭不論其形式的表現如何，要為是對十九世紀秩序的一種反動，如果從動態的趨向說，也是一種革命。這是一種反動從第一次大戰後便已見有端倪，在過去二十年中更成爲一種極重要的政治運動的推動力，到了這次的戰爭中它更有彰明顯著的表現。關於這一種革命的性質，英國當代第一流思想家如赫胥黎 (J. Huxley)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拉斯基 (H. Laski) 尼古爾遜 (Nicholson) 等都有過極透闢的說明，另一位作家在和平的條件 (Edward Hallett Carr: Conditions of Peace) 一書中，更有鞭辟入裏的詳盡分析。他們的看法雖有小異之處，但大體上是相同的，他們都認為：自第一次大戰以來至第二次大戰發生以前，世界雖然已經發生了許多驚心駭目的重大事變，但舊秩序仍舊保持着十九世紀的特徵，可是因爲環境的變化極爲劇烈，這種舊秩序已經到了窮則變的程度。世

界上有許多國家，尤其是那些在和約中保持優勢的列強如英法等民主國家，也許由於純粹的惰性，也許由於骸骨的迷戀，他們卻以維持現狀作爲最高的目標，反之，在那些對現狀不滿的國家中，野心及狂信的人物或黨團卻便先發制人，利用這一種人心思變的心理背景，把原來可爲建設性的力量，用之於完全破壞性的反動的目標上，於是糜爛之局勢所不免的促成了。

十九世紀舊秩序是建立於三種主要觀念之上的：一、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二、民族自決，三、放任經濟。這三個觀念在十九世紀中都是進步的口號。民主政治的意義，在於廢止皇權及軍權的專橫統治而代以法治。淵源於法國革命，至巴黎和會而臻於登峯造極地位的民族自決，曾經成爲一種向心的統一力量。至於由自由經濟所解放的生產力，在近百年來所創造的豐功偉績，更是無待說明的事。但是由於二十世紀以來經濟技術的發展，從而在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發生的相應的劇烈變化，已經或正在使這種過去爲嶄新進步的口號逐漸失去了內容。在工業組織較爲發達的國家，資本與勞力分別已有嚴密的組織，他們利用組織的力量直接參加國家政策的決定，他們纔是政治生活中的動力。在這種情形之下，以選舉權爲表現形式的政治權利，已成了一種告朔餼羊，畫餅不能充飢的東西。民主政治失去了動力，成爲一種虛有其表的空架子，平等自由的標語反成了一種受人詬病的話柄，人民爲了獲得起碼條件的經濟保障，遂不惜犧牲政權爲價付的代價。同樣的經濟發展，使民族自決發生了破綻，簡單的說來，民族國家在世界社會中作爲一個政治單位實在太小了。現代生產組織是以世界爲規模的，極端的民族自決把經濟上應該合而爲一的大單位割裂成爲無數的小單位，終極則使生產的效率大受障礙，人民的生活水準發生一般的降低。不單此也，近代軍事技術的突飛猛晉，尤其是空中戰術的進步，已使較爲弱小的國家非與強國訂立同盟的關係不可。軍事上一如經濟上都需要有一種區域性的甚或世界性的聯盟 (regional or world confederation)。至於自由經濟的破綻，自一九三〇年經濟恐慌爆發

以來，便有充分的暴露，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主義成爲普遍的現象，即在戰前仍然保持自由經濟面目上的英美，政府的權力也不得不迫而開始干涉國家經濟的活動了。

在這種窮則變的心理背景之前，所不幸的是讓軸心國家得風氣之先，着了先鞭，而民主國家除了蘇聯以外，卻在保持現狀的策略之下，只能作枝節的應付，形成了戰前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相形見绌與捉襟見肘。在這一方面德國的例證表現得最爲澈底明白。德國的人民在韋瑪憲法之下，獲得了政治的權利。但這種政治的權利並沒有經濟的內容，數百萬失業工人的經常的存在，更搖動了對議會式自由民主政治的信心。民主政治在十多年共和政府之下始終不能奠立堅實的基礎，連共和政府最後一位總理白魯寧(Bruning)也不得不借重與登堡的聲望，用緊急命令來維持統治的權力。這種脆弱的民主政治，經不起國社黨的攻擊，而趨於瓦解的一路，也是不足異的。國社黨所有的積極設施，許多都是可以非難和申斥的：在政治上它以「領袖的原則」(Führer Principle)代替了議會政治，在經濟上它實行國家的管制，並以大規模的擴充軍備，來解決失業問題，在精神上，它建立了一個以恐怕與憎惡爲基礎的龐大的宣傳機構，使全國的人民常在憤恨的激動之中。不過無可否認的，它抓住了人心思變的心理危機，它給予了民衆以一個新的政治秩序。國社黨人所建立的政治秩序，在我們看來固然是要不得的，但第一、德國人民在國社黨的宣傳機構之下，並不能作客觀的批判，如果仍有反對的，自有秘密警察和集中營去收拾。第二、希特勒的恐怖的統治，同時卻給了被統治者一種起碼的安定。國社黨登臺的三十一四十年代，正是一個動亂的飢者易爲食的時代，一個溺水的人，連一把蘆葦草都會當做救生圈抓住的。德國的這種局面，在戰事發生以後遂造成了一種乍看起來似乎矛盾的現象：德國明明是侵略國家，但就它所宣傳的口號來說，除了

其種族主義以外，如歐洲的聯盟，經濟的合作，卻都是歐洲人心期嚮的目標；反之，英法明明是反抗侵略的國家，卻一直到法國崩潰的前夕，纔有英法聯邦計劃的提出，直至美國加入戰爭以後，戰爭目標纔成爲現實政治中的一個論題。其間的基本原因，在於國社黨利用了人心思變的心理背景，取得了一種推陳出新的制先之權，不管其建設的成就如何，在消極方面卻是一種革新力量，所不幸者，這種力量在野心者的手中已經歪曲成了歷史上的逆流。這一點與拿破崙和法國革命的關係，頗有相同的地方。拿破崙的窮兵黷武，無意之間把法國革命的觀念布及於全歐洲，但法國革命中基本觀念的能否存在下去，卻是以拿破崙的失敗爲條件的。同樣，希特勒證明了現狀的不值得和無法維持，舊秩序的勢所不免的崩潰，但如果建立真正以自由平等爲基礎的新秩序，對於希特勒及其徒黨的統治，卻非先加以澈底的摧毀不可。

由上面的分析，也可以引申出一個推論來。戰爭已使十九世紀舊秩序的破綻充分暴露了，民主國家也已經有具體的認識。目前最迫切的問題，自然是在於用全力摧毀軸心的軍事實力，把軸心國家宣傳機構渲染的「新秩序」加以粉碎，但單具這一點是不夠的。在目前的戰爭中，各方關於戰爭的目標雖然仍有異議的存在，但目標決不應是現狀的維持。變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認爲軸心國家變的內容是反動的，是歷史上的逆流，那麼民主國家應該自己建立起一種與新的時代背景相應的新秩序。例如德國以血腥的奴役，建立起一種自斯匹茲白根至地中海岸的區域制度，這一種血腥的奴役統治，自然應該予以消滅，但歐洲的聯合或區域制度這一個變局是不特應該加以接受的，而且更應該積極使之建立於公道平等的基礎之上。世界之能否有終極的和平，關鍵毋寧要看目前正向軍事勝利之途邁進的國家，能否提出一個與變局相應的行動綱領來。